简论契丹大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

额尔敦巴特尔（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内容提要： 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是具有承接关系的文字，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具有语言文字学、历史、考古学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历史及其关系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对女真大小字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还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关系方面的研究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出土的契丹大字资料。最后统计、归纳、整理现存契丹大字并对契丹大字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契丹文字　女真大小字　关系　契丹大字资料　性质

契丹族和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北方民族，他们先后建立了辽朝和金朝，并创造了各自的文字——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是具有承接关系的文字，虽然这两种文字早已成了死文字，但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具有语言、文字以及历史、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

契丹人“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①]。建国以后，依仿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字。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太祖耶律阿保机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了一种“以隶书之半加减”而成的文字，史称契丹大字[②]。此后不久，又创制了另一种契丹文字。《辽史》记载：“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③]。契丹大小字创制以后，与汉字在辽朝境内通用。

辽亡以后，甚至在女真文字创制以后，契丹文字还被沿用到金朝中叶。金初的金银牌都是契丹字刻成的[④]。天会十二年(1134)的陕西唐乾陵《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碑[⑤]和天德二年(1150)的《萧仲恭墓志》[⑥]以及大定十年(1170)《博州防御使墓志》[⑦]是用契丹小字刻成的，甚至到大定年间，译汉字经书时契丹字还作为媒介[⑧]。金世宗也说过：“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真字科，虑女真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⑨]。以此看来，契丹字在当时已成为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了。契丹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4月，才被金朝明令废止。“谕有司，自今女真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12月，“诏罢契丹字”[⑩]。据出土的契丹文资料都是契丹小字这一现象来看，难认难学的契丹大字在金代基本未得到传播，只是在符牌、印章等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契丹字从神册五年创制到明昌二年废止为止，使用了将近300年。

辽朝灭亡以后，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是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女真人建国以前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仍处在“无书契，无约束”的原始状态。《金史》记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⑪]。随着金朝的建立和女真民族的大统一，以完颜部方言为基础的女真共同语便形成了。有了共同语，就有了创制女真文字的基础。女真人建国不久，便依仿契丹字和汉字，创制了自己民族文字——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关于这一点《金史》记载：“太祖命完颜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其后熙宗亦制女直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⑫]。女真字一直沿用到明朝中叶，最终被蒙古文字取代。女真文从创制到失传，达三个多世纪之久。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除了几个最古老的文明民族以外，大都是在相邻民族的早已存在的文字基础上形成并接受其影响的，契丹族和女真族也不例外。当时，契丹人与汉族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依仿汉字创制契丹文字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又受回鹘文字的影响创制了更适合契丹语言特点的契丹小字。女真文字则是在契丹文和汉文的基础上创制的。据史书记载，契丹大字有3000多字，因此契丹大字无疑是一种表意成分多的文字。但是每一种文字都必须适应所要记录的语言特点。契丹语是粘着型语言，用表意成分多的文字记录有丰富形态变化和语法变格的契丹语，当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为了克服契丹大字的缺陷，仅仅几年之后，迭剌受回鹘文字的启发，创造了一种拼音式的契丹小字。但是契丹小字颁行以后，却没有废弃契丹大字，而使契丹大字、小字同汉字在辽朝境内通行，这也是一种奇特现象。

那么，契丹大字和小字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在锦西西孤山《萧孝忠墓志》出土以前，各家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人甚至把契丹大字同女真大小字混同起来[⑬]。1950年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了另一种契丹文字以后，才有了两种文字相互比较的条件。此后，金光平、曾毅公通过对辽庆陵哀册和锦西萧墓两种文字的比较，认为，西孤山萧孝忠墓志上的契丹字是增损汉字笔划制成的，没有拼音字的迹象，与契丹大字制字的说法相合，所以是契丹大字，辽庆陵哀册文字，采用汉字字形制成若干音节字母，用之拼写语词，正合依仿回鹘文字制度的说法，所以是契丹小字[⑭]。他们的这一结论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承认。7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契丹小字研究领域里获得了可喜的成果。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的专著《契丹小字研究》是这些成果的代表。该书充分肯定了金光平先生在契丹大小字问题上的看法，并进一步作了补充和论证，指出，“契丹小字是在汉语反切知识的启发下，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造出来的一种介乎音节和音素之间的拼音文字”。这一结论，更加深了我们对契丹大字和小字的认识。

不过现存的女真文字（石刻文字和《女真译语》等所录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到底属于大字还是小字，是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是女真小字[⑮]，有些人认为是女真大字[⑯]，还有些人认为是女真大字和小字混合的，即意字和音字相结合的文字[⑰]。还有些人认为，现存的女真文字，似应为改变了原来女真小字书写形式的女真小字[⑱]。

葛鲁贝等所持的现存的女真字为女真小字的看法显得太简单了。60年代初，我国著名女真文专家金光平针对当时一般认为传世的女真文字为女真小字的看法提出疑问以后指出，传世的女真文字是女真大字。并根据女真进士考试策用大字，诗用小字的记录，预

言,发现了女真文诗就可以彻底解决女真大小字问题[18]。但是后来女真文资料的新发现,尤其女真文《奥屯良弼诗刻石》[19]和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的女真文残页的发现[20],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女真大小字问题。《奥屯良弼诗刻石》上的女真字与传世的其他女真文资料中的女真字仍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书写形式上存在不同。女真文诗刻的书写形式是每个语词构成一个书写单位,由几个字拼写而成,助词单独书写而不附在前面的词上。这种书写形式大体上与熙宗时期国信牌上的女真字书写形式相同[21]。这正好与《金史》所载"诗用小字"的史实相吻合。

另一方面,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发现的女真文残页,为探讨女真大小字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金启孮教授在《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一文中对这些残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女真文残页,共11件,书写女真文字237行,2,303字,其中不清者566个字,完整者1,757个字,实有字数1,000左右。金启孮教授认为,这些女真文残页所抄录的就是完颜希尹所撰的《女真字书》。《女真字书》的文字就是女真大字。女真文残页所抄的《女真字书》与《女真译语》有密切的关系,它可能是以后《女真译语》中"杂字"部分编写时的一个范本。女真文残页上的文字几乎全是"完全意字",还有一部分表音文字,不过表音文字的比例很少。

我们现在所说的传世的女真文字是指从金代遗存下来的碑刻、印侧文字以及明代的《女真译语》、《永宁寺碑》上的女真字,总共不到1,000个女真字,其中纯粹的表意文字150个左右,能够起表意字作用的不完全意字约有120左右,其余都是表音字。女真语是粘着型语言,许多词类都分为词干和词缀两部分,其中名词词缀约有30多个,形容词词缀约有10多个,动词词缀(助动词)有50左右。此外女真语的格有7个,12个格助字,与满洲语差不多。正字法上有些例外和特殊问题之外,严格遵守女真语言的元音和谐律,而且还有略似汉文反切的拼读法。这些特点表明,传世的女真文字已发展成比较完备的文字体系了。完颜希尹最初创制的女真大字肯定没有这样完备。

黑龙江下游特林地方所建的永宁寺碑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碑阳为汉字,碑阴刻有对译的蒙古字和女真字。为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从文字结构上看,《永宁寺碑》中的女真文音字比例比金代女真文石刻要高;意字主要用来表示天、地、人、子、大、小以及基数词等基本女真语词汇。基本昭示了女真文字向意音相结合的文字体系发展的过程[22]。

如上所述,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不同体系的两种文字,契丹大字是一种表意成分占绝对多数的文字,而契丹小字是一种介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参照契丹大字而创造的女真大字在文字的性质上也是和契丹大字相同的,但是女真小字并不是参照契丹小字而创制的拼音文字。如果用女真大字是参照契丹大字的,因而女真小字必然也是参照契丹小字而制成的拼音式文字的简单的区分方法来区别女真大小字,是很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以上提出的西安碑林女真文字书、奥屯良弼诗刻石和金代石刻及明代《女真译语》永宁寺碑等现有女真文资料上的女真字的比较、分析,金熙宗所制的女真小字不是像契丹小字那样另造了一种文字体系,而是在女真大字的基础上,参照契丹小字的书写形式,增加音字成分,淘汰一些意字而对女真大字进行了改造。在文字体系上还是属于完颜希尹的体系。熙宗以后的女真文字实际上就是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俱行用"时期,

大字中不易记忆的部分逐渐被淘汰,容易掌握的音字部分取代了其地位。到金代中期,契丹小字似的叠写形式也消失了。从而形成了女真大小字之谜。

总之,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在文字的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相结合的文字。女真小字是在女真大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女真大字和小字的根本区别在于表意和表音成分的多少与书写形式上的不同。大字的表意成分多,小字的表音成分比大字绝对多。虽然女真字是在契丹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大字和小字之别,但是其发展道路却不一样。女真文字与汉字基础上产生的日本假名文字的发展颇相似。

契丹语和女真语是阿尔泰语系两个古老的语言,前者属于蒙古语族,后者属于满洲-通古斯语族。契丹语和女真语早已成了死语言,其文字也成了死文字。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前后使用了将近五个半世纪之久。契丹字和女真字的研究对北方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考古等学术领域都有重要意义。由于《女真译语》这样工具书存世,加上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有较多可资比较的条件,所以经过国内外学者100多年的努力,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契丹语言文字的资料寥寥无几,更没有类似《华夷译语》这样的工具书传世,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成为当今世界最难攻克的堡垒之一。时至今日,契丹小字研究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契丹大字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探索阶段。尽管契丹语和女真语不属于同一个语族但契丹、女真族交往的历史是相当长的,两种语言相互影响,留下许多可资比较的成份。不仅如此,记录这两种语言的文字——契丹字和女真字之间的关系还更为密切。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对契丹、女真文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解读契丹文字的阶梯。契丹文字释读的增多,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契丹语言的情况。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东胡各族的语言同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23]。新近出土的耶律羽之墓志铭更明确了耶律氏同鲜卑檀石槐之间的遗传关系[24]。女真语中还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蒙古语形式。总之,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契丹文字的进一步释读,进而推动阿尔泰语系语言史的研究。契丹文字的进一步释读,反过来可以增加我们对女真文字的认识,促进女真文字研究的深入。

二

很早以前,国内外学者注意到了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密切关系,并且进行了不少的探讨。最早提倡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比较研究的是日本的斋藤武一。他撰写过《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一文[25],对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的比较进行了尝试。后来他所提倡的这种研究方法逐渐被学术界接受,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山路广明是50年代日本女真文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撰写了很多关于女真文和契丹文研究文章。1958年撰写的《女真文字制字研究》[26]一书是他多年研究女真制字规律的总结,也是他的代表作。他把女真制字方法归纳为10种,开创了女真制字方法研究的先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从而促进了女真制字规律研究的深入。山路氏在此之前也写过《契丹制字研究》一文,把契丹制字方法归纳为10种[27]。他对契丹大字和小字的看法跟现在大多数人相反,把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契丹大字说成小字,把契丹小字说成大字。这可

能是当时作者缺乏契丹大字资料而造成的错误吧!

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一文指出,现存的女真字是依锦西契丹字所制,所以仿照锦西字制成的女真字也应该是大字。熙宗所制的女真小字当然是仿照契丹小字制造的一种音节音缀文字。

金启孮《女真制字方法论》一文同山路广明就女真制字规律进行了商榷[7]。他首先指出山路氏所提出的制字方法的不足和错误以后归纳出女真制字的6种方法,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金启孮编纂的《女真文辞典》[8],以汉字笔画排列女真字,每个女真字后注明其出处和读音,并且注有一些女真字的字源。辞典中举出150多个女真字的字形与契丹大字相同或相似。该辞典不仅仅是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而且对女真字和契丹字比较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帮助。

蔡美彪的《女真字构制初探》提出不同于山路氏和金氏的意见[9]。他提出了3条女真字依据汉字制字的方法,2条依仿契丹字构制女真字的方法。

田村实造《契丹、女真文字考》一文认为,现存的女真文字是女真大字和小字的混合体。女真大字是表意文字,女真小字不是合成文字,而是像日本假名文字那样每一个字是分开的,从上往下排成,字行从右往左排列。女真小字不是以组合而制成文字方面与契丹小字有明显的区别。现存的女真文字像日本的汉字和假名混合成的文字那样,使大字和小字混合起来记录女真语。像这样考虑女真大小字的话,可以理解《金史》熙宗本纪的所谓"女真大小字俱行用"的疑问。

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一文[10]认为,完颜希尹所撰女真大字是依仿汉字楷书体,因袭契丹大字制度,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通过借用、改笔等方法,制成若干能够表达女真语意义的词字,而这些词字所代表的音值是不固定的,有的代表一个音节,有的代表几个音节。而女真小字是在女真大字的基础上制成的表意表音相结合的文字。其书写形式是依照契丹小字的叠写形式,每一个词必须组合成一个字,格助词需要单独书写,不附在前面的词上。实际上,女真小字是表意字向表音字转化的过度形式。现存的女真字似为改变了原来女真小字书写形式的女真小字。它是大定年间正式定形、定音、定义,形成较为完备的、能够适应女真语言特点的文字体系。作者还指出,女真大小字之间没有根本的、本质的区别。小字是在大字基础上增加许多表音字而成为意音结合的文字,并且音字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意字。由于女真文字的这种特点,才形成了今天的女真大小字之谜。

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和《契丹大字与传世的女真文字》[11]两篇文章也是探讨女真大小字问题的。作者的观点与田村实造很相似。前文通过辽金时代金银牌上的文字研究,对女真大小字问题进行探讨。后文是在契丹大字与女真文字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利用女真文新资料对女真大小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完颜希尹所造的女真大字是仿照契丹大字而制成的,是一个字表达一个完整词义的表意文字。所谓熙宗所造的女真小字实际上是在契丹小字和它的书写形式的影响下,对正在向表音文字发展的女真大字作出书写上的改革而已。作者最后得出"传世的女真文字是表意和表音文字相结合的文字体系,也就是说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混在一起的文字体系"的结论,并指出,这大概是"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的真实所在。

刘凤翥《契丹文字与汉字和女真字的关系》一文[12]对契丹大小字与汉字和女真大小字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女真字参照契丹大字制字方法主要有下列几种:(1)形音义方面均来自契丹大字;(2)字形、字音仿自契丹大字而不用契丹大字的字义;(3)参照契丹大字的字形字义而不用其字音的造字方法。

契丹大字是世界上最难解读的古文字之一。尽管如此,随着契丹大字资料的不断出现,国内外学者解读了不少契丹大字。

阎万章的《锦西西孤山出土的契丹文墓志的研究》[13]、《关于契丹大字墓志铭纪年的考释》[14]、《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的考释》[15]等文对契丹大字的"统和"、"大安"、"咸雍"等年号,"九"、"廿"等数字,"马(午)"、"羊(未)"等干支进行了解读。

在契丹大字研究方面,刘凤翥先生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他先后发表了《契丹大字的纪年考释》[16]、《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17]、《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18]等10多篇文章。对契丹大字的年号"重熙"、"应历"、"天赞"、"大康"、"清宁"、"道宗"、"圣宗",数字"四"、"七"、"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干支"龙(辰)"、"蛇(巳)"、"猴(申)"、"鸡(酉)"和契丹大字的"仪天太后"、"都招讨"等字进行了解读。

日本的丰田五郎在《契丹隶字考——女真文字的源流》[19]、《关于契丹大字中的日期》[20]、《契丹大字解读的线索》[21]等文章中对契丹大字的"太师"、"太付"、"太保"、"太尉"、"太子"、"郎君"、"国舅"、"帐"、年号"大康"、干支"虎(寅)""蛇(巳)"等字进行了解读。

此外,阮廷焯、金永田等人也对一些契丹大字进行了解读[22]。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对契丹大字和女真字方面的研究概况。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并且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基础。

三

金启孮教授编纂的《女真文辞典》对现存女真文字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整理和解释。但契丹大字的统计、整理工作还没有开展。作为契丹大字和女真文字比较研究的基础,首先对现有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做还可以为契丹大字的电脑处理提供方便。现存的契丹大字资料有如下:

1)《耶律延宁墓志》

1964年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柏树沟村。辽圣宗统和五年(986)的文物。该墓志所刻文字24行,前18行上半部为契丹大字,下半部及最后6行均为汉字。契丹大字共271字,汉字512个。现存辽宁省博物馆[23]。

2)《北大王墓志》

1975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昆都镇伊和嘎查。是重熙十年(1040)的文物。志盖上刻"北大王墓志"5个隶书汉字,志盖背面刻汉字21行,共510字。志文刻契丹大字27行785个字。现存阿鲁科尔沁旗文管所[24]。

3)《故太师铭石记》

1939年出土,但原出土地点不详,原石下落不明。现仅存1942年出版的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上发表的三张该碑的照片。志盖上刻写汉字"故太师铭石记"6字。

志文刻契丹大字40行,约有1,700多字。是重熙二十五年(1056)的文物[⑦]。

4)《萧孝忠墓志》

1951年出土于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辽道宗大安五年(1089)的文物。志文刻契丹大字18行,每行字数不等,共540字。现存辽宁省博物馆[⑧]。

5)《萧袍鲁墓志铭》

1965年出土于辽宁省法库县柏家沟乡前山村。辽大安六年(1090)文物。志文有契丹大字15行,326个字。现存辽宁省博物馆[⑨]。

6)《耶律习涅墓志》

1987年出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乌兰坝苏木小罕山。志盖上篆书阴刻"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3行9字。志盖背面楷书阴刻契丹大字37行,每行字数不等,共1,616字,是天庆三年(1113)文物。现存巴林左旗博物馆[⑩]。

7)《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

此碑原立于赤峰市宁城县十家子村,现在移往宁城县辽中京遗址白塔下。该碑正面刻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由于磨毁改刻和风化,契丹大字部分漫漶不清。

8)《应历碑》

原石出土地点和下落不详。贾敬颜先生在解放初期从旧书店购得一份拓片。拓片共有契丹大字16行,约39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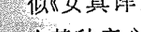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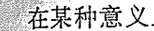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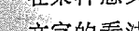
9)《耶律祺墓志》

1993年出土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朝格图山南麓。契丹大字46行2,800多字。现存内蒙古文物考古所。

此外还有《辽太祖墓碑残石》(现存内蒙古博物馆)、《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残石》(现存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馆)《"太付太太"银匕铭文》(现存辽宁省博物馆)、黑龙江省阿城市出土的符牌(黑龙江省博物馆)和若干契丹大字的印章、摩崖题字等。契丹大字见于史载的仅《书史会要》(元、陶宗仪撰)上提到的"朕、款、走、马、疾"5个字,这又是宋代王易的《燕北录》中转引过来的。

以上列举资料中的契丹大字加起来总共有8,000多字。我们首先从书写镌刻最工整,并且拓片最好的《耶律习涅墓志》入手,对所有碑刻中的每一个契丹大字做了详细的卡片,卡片上记录了每个字的出处、行数等,总共制成近2,000张卡片。在此基础上,按契丹大字的"横(一)""撇(丿)""竖(丨)""点(丶)"笔画顺序加以排列(由于篇幅和印刷不便省略),共得出契丹大字1,870个字。其中有些字可能属于异体字而有重复现象,但有1,800个契丹大字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史载契丹大字有3,000的说法不误的话,我们已经列出了其中的2/3,还有1/3的大字尚未被发现。在此基础上又同女真字、汉字进行了比较,得出与女真字字形相同或相似的有480多个,占现存女真字的1/2。由此可以看出,契丹大字和女真字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些契丹大字和女真字不仅在字形上,而且在字义、读音方面可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根据现在的释读情况,可以确定契丹大字和女真字字形,字义相同或相似的有30多个,字形和读音相同或相似的有十几个。不过这是依靠汉字的关系来推定的,准确程度有多高,还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推敲。由于契丹语言文字资料中可资比较的材料太少,女真语言文字的材料也不能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所以契丹文和女真文

的比较研究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

经过对契丹大字的归纳、整理和与女真字的比较,使我们对契丹大字的性质加深了认识。女真字是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契丹大字和女真字是性质相同的文字体系。1973年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字书残页记录的是完颜希尹最初创制的女真大字。这些残页上的女真文字几乎都是一个字代表一个词义的"表意文字"。还有不少字完全同于契丹大字,说明这是女真造字初级阶段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由两个字表示一个词义的文字,如,"玉存(旗)"、"(盔)"、"(缨)"、"(鞍)"等,说明女真大字也有表音成分,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一个字表示一个词的表意字。更何况残页所录女真字正是类似《女真译语杂字》式的词汇,从中看不出女真大字如何表示女真语法形式的情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女真大字也是一种表意表音相结合的文字。那种认为女真大字就是表意文字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是绝对化了的。

契丹大字也有表音成份,刘凤翥先生认为,契丹大字除了表意文字之外,还有一部分表音文字,如,由"尘寸"3个字来拼写一个"铭"字义。用"日之"3个字表示一个"薨"字义等[⑪]。大字中有用两种不同的写法表示一个词义的现象,如表示"统和"年号的字在大字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写法。一个用""字来表示,另一个则用"戎"两个字表示。前者即"完全意字",后者则是表音性质的文字了。再如《〈太付太太〉银匕铭文》里""字表示"银匕",所以可以说此字是表意性质的。但这个""字在其他契丹大字碑铭中屡有出现,很难想象此字到处都代表着"银匕"之义,只能说明这个字又演变成表示语音的音字了。

契丹语和女真语不是汉语式的孤立型语言,而是粘着型语言,具有发达的词尾变化。用表意字表示不变化的词干不会有什么困难,而表达这些语言的形态变化和语法形式却要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大字若没有表音文字的话,就无法完整地表达契丹语言。以上例子就证明了契丹大字中存在表音成份的事实。所以,刘凤翥先生所提出的契丹大字是"表意和表音相结合的文字"的看法是有道理的[⑫]。完颜希尹依仿汉字楷体,因契丹大字的这种制度,合女真语言的特点所创制的女真大字,恰恰承袭了契丹大字的意音相结合的性质和特点。

文字有其发展的规律,即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所记录的语言特点。契丹大字的初始阶段有大量的汉字毫无改动地被借用过去了,却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又有明显减少的痕迹,辽代后期的契丹大字碑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还有音字扩展,意字减少的迹象。这些都说明契丹大字也曾向拼音(音节)文字发展。这个发展过程被契丹小字和汉字及女真文字所阻碍了。女真文字却是在契丹大字的基础上创制和发展的,所以它有比契丹大字更先进的特点,尽管它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改革,最终还没有变成完全的音节文字体系。(收稿日期:1996年1月12日)

[责任编辑　彩娜]

注释:

①北宋·王溥:《五代会要》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元·脱脱等撰《辽史》卷2,本纪第2,太祖下;卷75,突律不传;卷76,鲁不古传。中华书局校刊本,北京,1974年。

③同上,卷64,皇子表。

④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⑤⑥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

⑦朱志民:《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 年第 9 期。

⑧《国朝文类》卷 57,元好问《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大定初,朝廷无事,世宗锐意经籍,诏以[契丹]小字译《唐史》成,则别以女真字传之,以便观览。公在选中,独主其事。书上,大蒙赏异。擢国史院编修馆,兼笔砚直长,改置'经书所',经以女真字译汉文,选贵胄之秀异就学焉"。

⑨《金史》卷 51,《选举一》。

⑩同上,本纪第 9,章宗一。

⑪⑫同上卷 73,完颜希尹传。

⑬清·刘师陆:《女真字碑考·续考》,考古,第 5 期,1936 年;清·麟庆:《宴台访碑》,《鸿雪因缘图记》第 2 集。

⑭《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考释》,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上刊登过本文摘要。

⑮葛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1896 年,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白鸟库吉全集》第 5 卷,1970 年;李盖提:《试论女真小字的解读》,匈牙利东方学报,1953 年。

⑱⑲金光平:《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 年第 2 期。穆鸿利:《女真文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北方文物,1994 年第 3 期。

⑰田村实造:《契丹·女真文字考》,东洋史研究,第 35 卷 3 号,1976 年,日文。和希格:《从金代的金银牌探讨女真大小字》,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⑱道尔吉:《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⑳罗福颐、金启孮、贾敬颜、黄振华:《奥屯良弼诗刻石初探》,民族语文,1982 年第 2 期。

㉑金启孮:《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文书》,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1—2 合期。

㉒颜华:《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社会科学战线,1976 年第 2 期。

㉓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 年,北京;和希格:《1413 年永宁寺碑与金代女真文诗刻》,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

㉔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4 合期。

㉕梁万龙:《耶律羽之及其族氏考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 年第 1 期。

㉖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时报》11 号,1941 年。

㉗油印本,1958 年,日文。

㉘油印本,1956 年,日文。

㉙㉛㉝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 年第 3 期,第 2 期,第 3 期。

㉚文物出版社,1984 年。

㉜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㉞台湾《大陆杂志》第 87 卷第 1 期,1993 年。

㉟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㊱辽海文物学刊,1990 年第 1 期,82 年第 2 期。

㊲㊳民族语文,1988 年第 3 期,1982 年第 2 期。

㊴与马俊山合写,文物,1983 年第 9 期。

㊵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1993 年,台北。

㊶东洋学报,第 46 卷第 1 号,1963 年,日文。

㊷京都产业大学国际语言研究所所报,第 6 卷第 1 号,1984 年,日文。

㊸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 年。

㊹阮廷焯:《若干契丹大字之解读》,《第 35 届阿尔泰年会论文集》,1992 年;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的考释》,考古,1991 年第 4 期。

㊺刘凤翥、于宝林:《〈耶律延宁墓志〉的契丹大字释读举例》,文物,1984 年第 5 期。

㊻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的考释》,文物,1983 年第 5 期。

㊼《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 3 号,1942 年。

㊽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的契丹文墓志的研究》,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㊾阎万章:《契丹文"萧袍鲁墓志"的考释》;冯永谦:《补萧袍鲁墓志出土的契丹大字墓志铭》,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㊿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的考释》。

(51)(52)《若干契丹大字的释读及其它》,汉学研究,第 11 卷第 1 期,1993 年 6 月,台湾。

契丹文字制字时借用汉字的初步研究

于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内容提要:从文字体系而论,契丹字是依仿汉字而创制的文字,有人称其为"汉字文化圈"。本文就此进行探讨,从而推断出,契丹字在借用与改造汉字时走的是一条简化与拼音的道路,故成今天我们见到的契丹小字所独具特色的"方块堆叠形"。而契丹字之改造汉字与汉字改革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借用它种文字之"壳"加以改造,使之适应契丹语;而后者却无适用一种新语言问题,是使文字更完善。最后,作者进一步对契丹字的利弊作了语言学的分析。

关键词:契丹文字　　创制　　借用　　改造

综观我国民族古文字,有这么一个特点,即一些少数民族在创制本民族文字时,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借用汉字并加以改造,我们对这些文字进行研究,看看他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借用汉字的,而在借用汉字时又是如何改造汉字的,很有意义。本文试图就契丹文字借用汉字这一特定情况加以研究,以作引玉之砖,希望引起民族古文字学界的学者们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契丹创造了两种文字

契丹于 916 年开国,建国后不久即着手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在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支持下,在汉人的直接参与下,陆续创制了两种文字,分别称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关于契丹大、小字的创制情况史籍都有明确的记载。史乘还特别载明了契丹大字的创制时间。

契丹大字。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辽史·太祖本纪》:神册" 五年(920 年)春正月乙丑(初二),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十四日),大字成,诏颁行之。"[②]

契丹小字。据《辽史·皇子表》载:"迭剌(阿保机二弟——笔者注),字云独昆。……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③]

这里的"大字"和"小字"的概念与我们通常汉字中的大、小字(指字体的形体之别)概念有所不同。契丹大、小字虽然都是纪录契丹语言,但却是形体绝然不同的两种文字,这是以创制先后而给予的称呼,创制在前的叫"大字",创制在后的称"小字"。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契丹文字资料,主要是考古发现的碑刻:墓志、官印、符牌、题记等,相对其它文种资料显然是很匮乏的,不仅与汗牛充栋的汉文资料无法比拟,就与契丹同时代(或稍后)的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资料相比,亦不如其多。然而,就在这极有限的契丹字资料中,两种形式的文字都有所发现[④],这就从实物上印证了历史记载创制契丹大、小字不误。

历史记载契丹创制了大、小两种文字，现在，两种文字也都见到了实物．然而，在我们所见到的两种文字中，哪种是契丹大字？哪种是契丹小字呢？弄清这个问题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大字创制在前，是原型，小字创制在后，是改进型．只有先弄清契丹大、小字，才能进一步分析和判明契丹字是朝着什么方向来改造汉字的．可惜的是，史籍对契丹文字的记载过于吝啬，没有明确地向我们指出契丹大字是什么样子，契丹小字又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现今还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两种契丹文字中，哪种是"大字"，哪种是"小字"．然而，学者们对此并没有坐以待旦，而是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探讨．

70多年前，人们还不识契丹字的本来面目．契丹字自元代以后渐湮，渐成为不可识的文字，明、清以降的一些大学问家，如编纂《石墨镌华》(万历年间成书)的赵崡和著就《金石萃编》(嘉庆十年成书)的王昶，以及号称乾嘉考据学大家的钱大昕等，皆将今日仍然耸立在陕西乾县武则天陵墓前的《无字碑》上，由金代人所刻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契丹字，误指为女真字，并言"一字不能辨"．这种状况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辽圣宗、兴宗、道宗三代帝后陵墓)出土了轰动学术界的契丹字哀册以后，方告结束．自斯时起，人们不仅确凿地认识了什么是契丹字(用哀册与《无字碑》上的文字一对照，方知碑上的文字是契丹字，而不是女真字)，并从此开展了对契丹字的研究．

然而，当时人们见到的只是一种文字．1942年4月，东北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先生在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上刊布了契丹字《故太师铭石记》的拓本，这是不同于庆陵帝后哀册的另一种契丹字，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作者对其文字不识，例举6点疑义，称其为伪造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对此种石刻的文字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直到1951年夏，在辽宁省锦西县的西孤山出土了与此种文字同类型的《萧孝忠墓志》后，学术界才纠正了指《故》为赝的历史冤案[①]．《萧孝忠墓志》最早刊布于1956年[②]，翌年，金光平、曾毅公先生在《考古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一文的摘要，此文首次对契丹的两种文字进行了科学的比较研究，结论是：西孤山式的文字是"契丹大字"，庆陵哀册式的文字是"契丹小字"．至是以后，不少学者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结论相同，可以说，金、曾两位先生的意见已经得到了契丹文字学界的首肯．

关于契丹大、小字的性质，也就是说，契丹字总体来说是属于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或者是意音文字系统？对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满的解决．这是因为，1.契丹字由于资料太少，至今大部尚未得到解读；2.关于契丹语言的资料，更是少得可怜，遍寻史籍，也仅是几个零星的词语和一两句话；3.契丹语久佚，今天又无活语言可参证[③]．这些都构成了契丹文字解读的困难，这也同样是妨碍人们对其文字性质认识的最大难点．尤其是契丹大字，除个别词语外，基本上未得到解读，要云其性质，尚为时过早．对于契丹小字，经过学者们几十年的努力，解读工作取得了诸多的可喜成绩，在解读过程中，人们对其性质的认识亦逐渐深入，按我们今天对其了解的程度，笔者认为，从大体上说，可以说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但仍很不严密的拼音文字．

二、契丹大字是如何借用汉字的

众所周知，"方块形"是汉字的一个主要特点[④]，契丹大字在借用汉字时也保持了这一特点．从形式上看，契丹大字与汉字一样，呈一个个独立的"方块"，文字形体以"字"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词"．"字"只能再分解为部首或笔画，而不能分解为字母或其它，也就是说，由字构词，而不是以字母组成词汇．契丹大字与同时代的汉字一样是由上至下竖写，由右向左移行．

单从形式上几乎看不出契丹大字与汉字有多大差别，如果将两种文字的资料放在一起，让一个不识汉字的人来辨认，几乎分不出哪是汉字，哪是契丹大字．然而，这仅是就文字形态而言，两者最本质的不同是契丹大字记录的是契丹语，而汉字纪录的是汉语．

契丹大字借用汉字不外是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借用，二是改变笔画．直接借用，不加改动．如：皇帝、太后、太王、一、二、三、五、十、廿、月、日、东、南、西、北、住、仁、位、弟、工、已、百、未、高、乃、此、至、午、田、亡、寸、殿等等，这种情况在契丹大字资料中所占比例不是很高，约有1/5左右．

改变笔画．如：未、允、寺、狩、省、乏、仚、景、为、苗等等．这些字对于懂汉字的人来说，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这其中，有一些字，经研究，知其来源于哪个汉字，也有很多至今尚未被证明出来．尽管如此，我们综合以上两种情况，还是能分析出契丹大字在借用汉字时对汉字的改造意向，这就是：简化(减少笔画)．分析如下：

第一，从总体来看，汉字笔画多，契丹字笔画少．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契丹大字与汉字相对译的资料，尚不能拿一段同样意思的话进行比较，只得先做个体字的比较．这里用《萧孝忠墓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和《耶律习涅墓志》前10字进行比较，视其笔画的多寡，一目了然．

汉　字	契 丹 字
《孝》：南赡部州大辽国锦州界	丹央冈不国省中狩益省
《延》：大契丹国故保义奉节功	未吕允央寺奈中狩省圣
《北》：乾覆坤载之中孕粹灵者	央肢斧太王戈在来尘大
《习》：故兴复军节度副使墓志	早寻南月国省克弟昇吴

第二，再从直接借用的汉字来看，以笔画少者为主．据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所有契丹大字资料，笔画最多的是"殿"(13画)和"道"(12画)，这两个字出现的次数都不多，前者在《故太师铭石记》中出现3次，《辽太祖碑残石》2次；后者仅一见，见《耶律习涅墓志》．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不可能将所有资料中借用的汉字一一列出来，我们还就前引的4件资料进行统计，将出现最多的字列下：仁(54见)，工(36见)，此(26见)，已(24见)，太(21见)，寸、午(19见)，月(18见)，二、日、田(16见)，五、王(15见)，十(14见)，住(12见)，皇、帝、弟、面(11见)，三(10见)，廿(9见)，乃(8见)，北、斤(7见)，高、南、正、未(6见)，至、舍、有、可、山、丁、一(5见)(为省篇幅，5见以下者省略)．在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字中，笔画最多的是"高"(10画)和"皇、帝、面、南"(9画)，其次，8画1字，7画2字，6画3字，其余有24字在5画以下；以上列举的35字中，平均不到5画．可见从简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在借用汉字时，为避免其笔画太多，其中借用了一些汉字简体字．如：国、床、会、来、将、万、弃、几等等．

第四，在借用汉字时，有的加以改造，主要是减少笔画，如：㐄←来，充←流，马←马，庆←疾，忌←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契丹大字制字时，借用汉字走的是一条"去其繁，从其简"的道路．

三、契丹小字在借用汉字时又作了哪些改进

如果说，契丹大字在借用汉字时还未脱离汉字的"方块形"的话，契丹小字则对"方块形"作了较大的

改造．它是对"方块字"进一步减少笔画，或舍去多笔画的字，造成"原字"[9]．以原字为基础，再"堆叠"成契丹小字的"字"．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指的契丹小字的"字"，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方块形"，而是由1—7个"方块"组成的"方块堆叠形"，具体组合方式为：

一组：为① (𠂉)；

二组：一般为①②()，个别为{①；②)；

三组：一般为①②③()，个别为{①②③()；

四组：一般为①②③④()，个别为①②③④()；

五组：一般为①②③④⑤()，个别为①②③④⑤()；

六组：为①②③④⑤⑥()；

七组：为①②③④⑤⑥⑦()．

这种组字方式在我国民族古文字中绝无仅有，独具特色，至今在借用汉字而创制的文字中未见有类似的情况．因而，作为一种类型的文字现象，确实有加以深入探讨的必要．

根据对契丹小字的综合研究，笔者认为，契丹小字之所以对汉字作这样大的改革，主要是拼音的需要．如果说，契丹大字由于资料与研究等诸方面的原因，我们尚不能确知其基本上为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的话，根据我们对契丹小字的研究与认识，我们说，契丹小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下面就来具体分析这个问题．

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原字"，即要弄清"原字"是音符，还是意符？"原字"究竟有多少个？严格地说，这个问题还回答不清楚，至今尚不能确切断言．这是因为：1.古代没有给我们留下类似"原字表"之类的东西，我们今天只能按照所见到的资料进行统计．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曾做过精心的统计，初定了378个字形；而以后又有新资料的发现，在这些新资料中又有新原字的发现，至今尚未有人再作全面的统计予以公布(有的新资料也还未正式发表)．2.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资料，绝大部分是地下出土的墓志，有的石质不好，风化很厉害，给辨字造成很大的困难(还有两件原石今已不见，留至今的是手抄本，由于抄录者不懂契丹字，直接影响到所抄之字的可靠性)．这就造成，有的字是同一原字，还是不同的两个原字，分辨起来非常困难．这里，我们暂且先依据《契丹小字研究》一书的统计进行研究．

在这300多个契丹原字中，除个别性质尚不大清楚外，绝大多数是表音的．

第一，在这300多个原字中，有1/3多的原字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读，这些字都是表音的，有的表音节，有的表音素．如"主"字，既可音译汉字"皇帝"的"皇"，又可音译作为姓氏的"黄"；"𠂤"音i，可组拼𠂤𠂤(懿)、𠂤𠂤(期)、𠂤𠂤(西)、𠂤𠂤(祭、济)、𠂤𠂤(密)、𠂤𠂤(礼)等；"𠂉"音l，可组拼𠂉爪(龙)、(令)、(梁)、(郎、廊)、(留)、(禄)、(类)、(礼)、(兰)、(洛)等．

第二，在这300多个原字中，我分析了一下，有这么三种情况：一是只单独使用，不与其它原字组

合，我们姑且称其为"独体"；二是只与其它字组合，不单独使用，暂称"合体"；三是又能单独使用，又能与其它原字组合，暂称"混体"．

根据对契丹字的研究，契丹小字的组合是一种拼音的组合，因而，"合体"与"混体"是表音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独体"．"独体"是表音，还是表意的呢？可惜的是，我们对这些独体字，释读得还很不理想．就已释读的字来看，如"𠂤"，既可译汉字"司空"之"司"，又可译"刺使"之"刺"，是表音无疑．既然"独体"释读不多，我们可用"混体"作参照，如原字"𠂉"，在单用时可译汉字"副、府、父、甫、驸、辅"，又可与原字"𠂤"(或"太")合拼为"鄂"，说明是音符．另外，据统计，在376个字形(去掉不构成原字的符号"…"和重复字符号":")中，"独体"只有32个，占总数8%强．可见，在说明文字性质上，它不占主要地位．就按最保守的说法，也可以说，契丹小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契丹原字的"方块"，虽然源借于汉字，但已与汉字有了质的区别，它已不是表意的符号，而改革成了表音的符号．在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契丹小字是一种借用汉字字形，以"方块堆叠形"为特点的拼音文字．既然如此，就不难看出，契丹小字之改造汉字，走的是一条拼音化的道路．

四、契丹字之改造汉字与汉字改革的异同

尽管我们对契丹字的认识还很肤浅，还有待于深入，但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契丹字在借用汉字创制本民族文字时，对汉字进行了改造，改造的方向道路是：一简化，二拼音．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恰与近现代我们对汉字进行改革所走的道路是一致的．

但是，契丹字之改造汉字，与汉字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契丹字是在借用它族文字时，对它族文字符号进行的改造；而汉字改革，则是对本民族文字进行的改革．因之，改革的条件与改革的目的都不相同．契丹字之改造汉字只是用其"壳"，使之更适合本民族的语言习惯和准确地纪录契丹语；而汉字本身的改革则不然，汉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已经适应了汉语，这方面不存在问题，汉字改革是改革其中的弊病(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难认、难写、难学、难用"[10])，使之更科学、更完善、更方便，是向文字更高层次发展的问题．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汉字的简化是成功的，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给行用带来了方便．汉字的拼音化也在深入讨论之中．而契丹字在借用、改造汉字时做得如何呢？下面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

五、对契丹字利弊的语言学分析

综上所述，契丹造字是以汉字为蓝本，借用汉字的基本形体——这是指文字的形态与范畴．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一种文字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看其能否准确而充分的表达语言，再有就是学习和行用是否方便．从语言来说，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一般以为属蒙古语族)，汉语属汉藏语系，两者不仅不属同一范畴，而且差距很大．就词汇来说，汉语最大特点是单音成义，就是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11]，汉字正是与此特点相适应，以每一个"方块"代表一个音节，也就是每一个方块字代表一个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汉字表意文字(或称意音文字)的特征；而契丹语言的词汇则表现为多音节的现象，例如"孝"音"赤实得本"、"金"音"女古"、"狗"音"捏褐"、"宫"音"斡鲁朵"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契丹造字，采用两种手段——简化与拼音——来改造汉字，这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契丹字来说，如果不走拼音的道路，仍保持汉字的表意文字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契丹字的拼音化道

路也是客观条件使之然。

然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如何借过来将其改变成表音文字，契丹字在历史上作了一次社会实践，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其中一些问题没有科学地解决好。

首先，我们看到，汉字的"方块"适应于汉语的单音节语，一字一义。"方块"作意符有其优越性⑫，但用来改作音符，则不如某些字母文字的"字母"简略、灵活、方便和适用。汉语词序固定，没有语法形态变化，而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是粘着语，词的派生和词的语法变化都以添加粘附成份为主要手段，有的在词干后接几层语法粘附成分表示几层语法意义，这些都靠一个个"方块"表示就显得很复杂。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契丹的"原字"造了几百个，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原字"不是音素，一般音素文字，几十个字母就够用了。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有的原字是音素，有的是音节，很不规范。上面提到的"独体"与"混体"都是表音节的，而占多数的"合体"(据统计，在 378 个字形中有 220 个，约占总数的 60%)，它不单独使用，只与其它原字相拼，内中就有不少是表音素的。作为表音的基本符号，契丹字造了近 500 个(加上新资料)，内中有相当部分是同音的。像这样，基本标音符号过多、过滥，说明文字很不严密，形成文字的繁复，不易学习和掌握，直接影响到文字的推广与运用。

再有，契丹字在改造汉字时，首先进行的是简化，而再进一步改造成拼音文字时，采用了"方块堆叠形"的办法，结果，写出来的字比汉字笔画还要多，还复杂，如  (孝)，这与简化的初衷又产生了矛盾，形成了一个很难摆脱的怪圈，这样的改造很难不陷入两难的困境。

由于文字本身的原因，再加上辽代社会文化等原因，笔者认为，终辽一代，契丹字虽被尊为"国字"，但从现有资料看，它并未能得到广泛的运用，成为人们普遍的交际工具。契丹字随着辽代的灭亡，很快被遗弃不用，就很自然了。(收稿日期：1995 年 11 月 21 日)

[责任编辑　彩 娜]

注 释：

①《新五代史》卷 72，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888 页。

②《辽史》卷 2，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16 页。

③《辽史》卷 6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967 页。

④历史记载女真字也有大、小两种形制，而我们今天见到的女真字资料中却只有一种。

⑤见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 年第 2 期。

⑥见刘谦：《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的辽墓墓志》，载《考古通讯》1956 年第 2 期。

⑦这一点就不如女真语，女真语是满语的前身，今天研究女真语可用满语参证。

⑧葛遂元云："汉字成为方块形音节字，而西方文字是词中各音速写的长短不齐的字。"(《中文语言文字与电脑试议》一文)；袁晓园、徐德江云："中文(汉字)是个性突出的方块字。"(《向中文信息的深度广度进军》一文)，均见《重新认识汉语汉字》一书，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⑨"原字"不是当时的称谓，而是今天学者们对它的指称，早年也有称"基字"的。

⑩见胡愈之：《吴玉章同志和中国文字改革》，载《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⑪这里指一般而言，不包括特殊的联绵字和叠字(这在汉语中占极少数)。至于汉语中的合成词与外来词，则是属于另一性质的问题，不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故在此不需赘言。

⑫一般认为，方块字简短明确，在表达同样的意思时它所占的单位面积(空间)最少。

对资本主义产生与确立问题的若干认识*

甄修钰(内蒙古大学历史系)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有关论述，结合具体史实，以及顾准等人研究成果，论证资本主义不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普遍自发地产生的，它首先在西欧出现，以后不断向全世界发展。但除北美和日本外，它总是不同程度地出现"难产"现象。即使在西欧，它也历经坎坷，从萌芽之地的意大利，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最后才在英国最终确立。因此，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确立是"曲折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而非"自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关键词：　资本主义　产生　确立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具有划时代意义。世界历史从此由分散走向整体，近代化文明从此由西方开始，而许多落伍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也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①。但是，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产生于西欧？为什么最先在英国确立？原来并不落后的地区又为什么迟到？这些已成为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的课题，因而也是一个争论颇多、意见分歧的课题②。因此，这个重大问题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试图依据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结合一定史实，对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确立的曲折性与必然性，以及它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命运诸原因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以供讨论。

一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它的产生与确立与以往的社会形态不同。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与以往社会形态的不同点就作了极其明确的概括。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都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则是"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③。这就是说，前三种所有制形式可以自然而然产生，而资本主义所有制则不能自然而然产生，必须创造相当的条件。不过，资本主义虽然不是每个民族都能及时地自然产生的所有制形式，却是一个有能力风靡世界、改变世界的所有制形式。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的方向，体现了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规律。因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

* 本文是读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遗作的体会，因而有关顾准论资的引文未逐一注出。